

欧陆回望

叶君健 著



叶君健

欧

陆

回

望

九

洲

图

书

出

版

社

君健

叶君健，1914年生于湖北红安县。早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曾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及辅仁大学外文系教授。业余从事创作和翻译。1949年以前，主要为外国读者用英文和世界语写作；1949年从欧洲回国后，主要用中文创作。有短篇小说集《叶君健小说选》、长篇小说《土地》、《寂静的群山》两个三部曲，中篇小说《暴风雨中的老人》、《暴风雨中的老人》、《暴风雨中的老人》及若干散文集；共约六百多万字。翻译作品主要有《安徒生童话全集》。现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笔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翻译》杂志主编，“世界文化理事会达·芬奇文学艺术奖”评委。



目 录

欧陆回望

一代精英	1
—— 回首“布隆斯伯里学派”	
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7
附录：“布隆斯伯里”中的一个中国人	12
忆李约瑟	18
“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里出生”	22
—— 访问奥登塞	
一个童话作家的“爱情”故事	37
和埃格纳的会见	42
一代“文苑精华”	55
普利斯特莱一家	77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亲属	106
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	110
1944—1945，一个文化人在英国	118
——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	

往昔情怀

老一代人	· · · · · · · · · · ·	· 132
一位憨直的朋友	· · · · · · · · · · ·	· 135
情系中新	· · · · · · · · · · ·	· 138
陈西滢和凌叔华	· · · · · · · · · · ·	· 141
抗战期间的中国作家	· · · · · · · · · · ·	· 153
记沈从文	· · · · · · · · · · ·	· 160

笔底烟云

译写思痕

一代精英

——回首“布隆斯伯里学派”

最近一位美国学者突然访问了我，询问关于“布隆斯伯里学派”的情况。这个学派由本世纪上半期英国的一代文化精英所组成，其著名人物有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意识流大师弗杰尼娅·伍尔夫，以及画家、美学家、翻译家、汉学家和编辑家等。当时我在英国，和他们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

我与“布隆斯伯里学派”的交往源于第二代诗人朱理安·贝尔。他原是1935年中英庚款委员会送到武汉大学外文系的一位年轻教授，在英国诗坛属“现代派”，很有声望，出过好几本诗集。我那时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读外国文学，他教现代诗和散文，我们逐渐成了很要好的朋友。1936年我大学毕业，那个暑假他要求我陪他作一次旅行，沿着转移到四川的红四方面军长征的道路去松潘——但路途险阻，我们到打箭炉（即康定）就已精疲力尽，无法前进，只好在那里结束。

旅行完后我回返武汉，随即去东京，在一个华侨学校教英文。我与朱理安·贝尔通信不断，内容除了个人生活和对当时世事的一些感想外，主要是有关当时在西班牙正打得激烈的反法西斯战争。他认为如果法西斯得势，西方文明就要被毁灭。他以保卫西方文明为出发点，思路逐渐转向直接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我支持他的想法。1937年4月，他毅然放弃教授职位，奔赴西班牙。那时我在东京被日本秘密警察以抗日的罪名逮捕，正蹲在监狱里。8月上旬我被驱逐出境，回到武汉，我立刻写

了封信给朱理安·贝尔的母亲，询问贝尔去西班牙以后的情况。她很快回了信，说贝尔在7月间已在西班牙艾斯古里埃尔前线牺牲！

从此我与朱理安·贝尔的母亲瓦涅莎也建立了友谊，不时通信。1944年我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到英国各地巡回演讲，才得到机会去看朱理安·贝尔的母亲并在他们家里小住，从而与他的家族和经常来往的朋友也建立了友谊。

贝尔家住在英国南部苏瑟克斯郡一个名叫路威士镇附近的乡下。他们的住屋是一幢孤零零的村舍，有两层楼，为了邮递的方便，单独起了一个名字——也算是地名：卡尔斯屯。它虽然是个孤独的村屋，但却是“布隆斯伯里”学派几个核心人物的集合点。除了贝尔一家外，意识流大师弗杰尼娅·伍尔夫和她的丈夫莱翁纳德·伍尔夫也住在两三里路之遥的一个村舍。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夫妇也住在附近。他们每星期总要见面一次，聊聊天，地点就是在卡尔斯屯，场合是饮午茶。

他们不避讳我，什么都谈。有一次他们的闲谈涉及欧洲政治的动向，瓦涅莎便从书橱里取出一叠打字纸。这批朋友中的每位成员，包括他们的子女，每人都在一张打字纸上写下“时局预言”。这是他们在新年前夕预测的有关新的一年欧陆战局的变化、同盟国的关系和英国本土的安全。每张纸上的内容都保密，彼此不得先看，由瓦涅莎一人保管。现在他们兴之所至，就把这一叠纸拿出来当众摊开，看谁的预测符合实际形势的发展。

凯恩斯有一次在吃茶时，倒是直接提到一桩有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事，而且此事牵涉到中国。那就是蒋介石在30年代搞中国币制改革，即从银洋改成“法币”，曾求教于英国的财政领导机构。凯恩斯在幕后提出了一些意见，使法币成为中国的正式通货。“只可惜蒋介石的政治本领不高明，他的政权岌岌可危，法币

也站不住脚，一天一天变得不值钱了！”但他没有再发挥下去。他个人所感兴趣的倒不全是钱，而是文化艺术。他是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的毕业生，对母校的发展很关心。他运用他理财的艺术，把这个学院的基金投资到利润优厚的企业，使这个学院成为剑桥一个最富有的单位。他还在学院附近建立了一个“艺术剧院”，英国的著名新剧差不多都在这里首次上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个“实验剧院”。

凯恩斯对艺术的这种热情与他的夫人有关。他的夫人洛波河娃是俄罗斯人，为旧俄的一个著名芭蕾舞演员。一次她随剧团到英国演出，充当《睡美人》的主角。凯恩斯在观看首场演出时，就着迷于她的美和表演艺术，在她演出期间，找到机会与她接近，最后两人成了眷属。她自然也欣赏他，认为他是个经济学“天才”——她也没有错，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及其所设计的措施，挽救了资本主义国家频发的经济危机达半个世纪。贝尔家每星期的午茶，她必来参加，而且还是一个极为生动的角色。

“布隆斯伯里”学派的成员中，有的是画家（瓦涅莎和邓肯·格朗特）、小说家（如弗吉尼娅·伍尔夫和 E·M·福斯特）、政治家（如奈翁纳德·伍尔夫）、美学家（如克莱夫·贝尔）、汉学家（如阿瑟·魏莱）、翻译家（如康士坦斯·加奈特）、著名编辑（如大卫·加奈特）等。这个“学派”的成员大都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王学院，这样，同窗之谊又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

但凝聚他们在一起的真正共同点，还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和实践：“生活的首要目的是‘爱’、美学经验的创造和享受及对知识的追求。”这里所谓的“知识”当然不是指一般知识，而是学术和哲学性的“知识”。他们在这方面的要求很高。他们的专业和兴趣各不相同，领域宽广，从汉学到俄罗斯文学，范围超过了西欧，而且每人造诣都很高。魏莱译的中国唐宋诗，影响了英国

以至西欧近代诗歌的创作。康斯坦斯·加奈特译的旧俄大师如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共两万多万字，还影响到了中国。“五·四”以后，解放以前，中国所介绍的旧俄名著，大都是从他的英译转译的。

他们的政治观点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不保守，也不迷信权威，是对英国保守传统观念的一种反叛，也是希腊人文主义和法国18世纪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变种，但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与他们的先驱斯德芬有内在的渊源。斯德芬反对资产阶级所推行的、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殖民主义的奴隶制度，在宗教信仰上是无神论者。在传统的英国文化体系中，“布隆斯伯里学派”的这种主张及生活方式和学术实践等于是革命；对维多利亚王朝的拘谨风尚的反抗，对这个朝代所推行的一切清规戒律的反击，崇尚人际关系的自由探讨和发展。它的影响遍及西欧和北美。在文学创作方面，弗杰尼娅·伍尔夫扬弃了高尔斯华绥这类大师们着重反映生活物质表象的创作方法，而寻求表达个人经验中最敏感的感官颤动的技巧，创造出一种印象派式的散文与抒情式的诗情相结合的小说风格，即所谓的“意识流”手法。这在小说创作中也是一场革命，这种手法虽然模仿者甚众——甚至现在仍有不少年轻作家模仿，但能真正成为艺术品的，仍然只有伍尔夫和乔伊斯的几部小说。

这个“学派”是文学史上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资产阶级文化发展到了高峰期的一种异物。西方知识界认为它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前无古人，也不可能再有来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方式迅速占领了作为西方文明的土壤的欧洲大陆，同时大规模轰炸英国。弗杰尼娅感到难以形容地情绪低沉，1941年她完成了《幕与

幕之间》一书后，就投河自杀了。她的死标志着一个光辉的文学时代的结束。这批大师们的第二代更敏锐地感觉到，在1929年纽约华尔街爆发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信号后，欧洲的文明的毁灭已经露出了端倪。而西班牙战争的扩大则为他们的敏感提供了佐证。他们走出父辈们的学术圈子，进入了行动的世界。于是朱理安·贝尔奔赴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欧美大量的年轻文学家和艺术家，如法国的马尔洛和美国的海明威，也向同一方向前进。在英国，年轻的诗人和散文家路贝尔特·康弗德（1915—1936，女诗人弗朗西斯·康弗德的儿子、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曾外孙）赶到马德里前线，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牺牲。

这新一代人已经否定了田园式的文士生活，而走向十字街头，转变成为保卫文明和民主的战士。他们与上一代人的唯一共同点，是他们也都受过剑桥大学的学院派训练（有少数出自牛津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围绕剑桥大学毕业的诗人约翰·莱曼编的一个文学丛刊《新作品》，而展开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个丛刊的视野从英国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发表新秀的先锋派作品，同时也不时刊载其他地域年轻进步作家的创作。30年代和40年代，我也在它上面发表过小说。英国当代一些新派作家和诗人，如小说家易粟伍德、诗人奥登和斯本德，他们也是在这个丛刊上初露头角，最后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易粟伍德和奥登1938年曾来过中国，到前方抗日战场上作过一番巡礼，我那时正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做外事工作，曾接待过他们。他们回去后写过一部书，名《战争之旅》。

但这一代人现在也大都作古，只有斯本德仍健在，1988年我在伦敦时曾再度与他相聚。我也是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的校友，与这两代作家有“同窗”的情谊——只是因为历史环境的不同，我的成长与他们大有区别，但是在文艺欣赏和人际感情方面，我们

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他们出生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盛的顶峰时期，维多利亚王朝的繁荣给他们的先辈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使他们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他们成长以后，先辈们又能给他们留下一定的遗产，使他们得以过与世无争的名士派田园生活，致力于从古希腊和罗马到维多利亚王朝西方文化的总体研究，从中衍化出他们的一种特殊文士生活方式。直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续袭击，使他们的生活基础受到动摇，他们的第二代才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这个“学派”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史上，他们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贡献，足以不断引起后人的怀念。

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我写过一篇回忆：《一代精英——回首“布隆斯伯里学派”》在文章最后，我提了一下这个学派的第二代：他们快要成为历史，只余下诗人斯本德一人了。前几天我接到剑桥大学的一位老学长普勒华寄来的信，告知我“你的朋友斯本德已于不久前去世了”。他的去世标志着 20 世纪西方一个重要文学流派的终结。

他们的上一代，也就是“布隆斯伯里学派”，继承了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和 18 世纪法国理性主义的传统，在文艺创作和人文科学方面，开创了一个熔欧洲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派创新于一炉的新时代。他们既是传统英国的知识分子，又是欧罗巴人。他们有他们的独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受世俗习气的拘束。他们自成一个体系，生活在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世界里。但 1929 年从纽约华尔街爆发的、冲击全世界的经济恐慌以及接着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兴起，再加之 1931 年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动摇了他们这个世界的基础。

他们的第二代，牛津和剑桥两个古老大学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意识到欧洲文化、及至世界文明即将遭到中世纪万达尔人式的摧残，就自动地离开了他们的艺术殿堂，走向十字街头，投进汉姆列特所谓的“生存或毁灭”的斗争当中。现代派年轻诗人贝尔，和剑桥女诗人康福斯的儿子、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曾外孙、诗人和散文家罗伯特·康福斯，都奔赴西班牙前线，在那里牺牲。牛津大学毕业的诗人斯本德，由贵族子弟学校伊登公学培养出

来的小说家和政论家奥威尔，也都赴西班牙参战。

保卫文明、抗击黑暗，这是本世纪 30 年代人类历史转折期，在西方高级知识界中，所掀起的一股新思潮。他们把这种思潮用行动体现了出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作家和艺术家（当然也不乏其他文化和学术领域的人士），其作品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西方的文学和艺术发展上正在产生影响。他们包括诗人和小说家、牛津大学出来的戴·路易士、诗人和剧作家奥登、小说家易栗伍德、诗人和学者麦克尼斯等。他们都出生在 1904 至 1909 年之间，正是风华正茂的时期，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创新与成就开辟了英国文学的新纪元，与西欧和美洲的新文艺思潮接轨，形成以所谓“现代派”为特点的当代世界文学主流。

这是一个政治与文艺相接合的“时代”。

他们“保卫人类文明”的行为并非一时感情用事，而是经过了认真的思想斗争的。斯本德加入了共产党，奥登、戴·路易士和麦克尼斯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展开了反法西斯的白刃战。在世界的文学史上，投笔从戎的作家固然不是没有，但大都是个别现象。像这样一代出自名门而又受过资产阶级所能提供的最好教育的一代文学“精英”这样做，在世界、在文学史上实属罕见。体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创作中的反法西斯的决心，影响了西方整个文学界。美国的海明威、法国的马尔洛，流亡在外的德国女作家西格斯和剧作家布勒希特，流亡在英国的意大利小说家西龙涅……有的直接去了西班牙战场，有的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展开了反法西斯活动。

反抗精神的另一面反射出他们对人类光明前途的憧憬。天际并不是没有一线曙光，这线曙光来自东边的苏联。苏联一直在埋头搞社会主义建设，它的成就弥补了它在西方知识界中所造成的误解，使他们怀着一定的热情遥望它的发展。一些有影响的

知识分子，甚至还想亲自去看看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从中寻求启发和灵感。苏联也趁机伸出欢迎的手，邀请他们前往访问。法国的文坛耆宿纪德（1869—1951）就得到了邀请。

纪德是怀着某种好奇心和热情前往的。他是一个充满了内心矛盾的人物，早年受过清教徒教育，后来又力求从严格的基督教义中解放出来；他既崇拜《圣经》，又倾心于尼采的哲学，一直在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异教徒的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斗争。他反对殖民主义——这在他的《刚果之旅》和《乍得归来》两书中表现了出来。他同时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和一种浪漫主义的期望。正因为如此，他去了苏联访问。回来后又写了两本书，其中《苏联归来再思考》于1937年出版。此时西班牙战争已滑入低潮，法西斯势力正要占上风，纪德就在这时发表了他访苏的观感。

这种观感影响了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特别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知识分子。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可以从他一段堪称“微不足道”的谈话中看得出来：他离开苏联时，陪送他到国境的苏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恳请他打个电报给斯大林，以表示他对这个伟大领袖的钦慕和感谢。他拒绝这样做，他的态度是：“个人迷信”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还谈什么共产主义？他的幻想破灭了，也引起了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最后法西斯终于在西班牙取得了胜利，佛朗哥在这个曾经一度是轰轰烈烈的反法西斯战场上建立了独裁政权。许多作家、诗人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在那里流的血变成了失望的回忆。于是像斯本德这样的诗人和奥威尔这样的小说家，就都宣布退出共产党。

1939年法西斯德国与共产主义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好景不长，希特勒很快就对波兰发动进攻，苏联也出兵占领了波兰的一半，英国随即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了。新的形势给西方作家和诗人们带来困惑，他们得重新定位，